

恐癌:

现在进入“环境敏感期”

本报记者 石念军

肺癌:21世纪“第一杀手”

刚刚过去的一周,连续几天雾霾天气,刻画出另一个“济南的冬天”。

1月15日,济南以PM2.5监测数500的“爆表”峰值,成为国内空气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城市。

就在这一天,47岁的郑华(化名)坐了5个多小时汽车,从济宁赶来齐鲁医院就诊。

一年前,他在这里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。如今,肿瘤复发。腹部长长的疤痕显示出他曾经承受的痛苦,疤痕一端凸起的瘤块又暴露出命运的残酷。

“我还能撑多久?”就诊时间里,郑华不断重复着一句话:

“不行,就不治了。”

这个罹患癌症的不幸者,惶恐,乃至绝望。

这样的肿瘤患者,齐鲁医院牛军教授所在的肝胆外科每月大约收治70位。而像郑华这样的恶性肿瘤患者,超过了七成。

《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》显示,恶性肿瘤已上升至大城市居民死因第一位,超过了脑血管疾病。而在所有恶性肿瘤死亡率对比中,肺癌高居发病死亡率的首位。

据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组织的恶性肿瘤死亡调查,从

1973年至1992年的20年间,国内肺癌死亡率上升了111.85%,北京市肺癌死亡率30年增幅167%,北京、上海、沈阳等大城市,已成为令人瞩目的肺癌“大户”。

山东省肺癌死亡率同样呈全面上升趋势。2009年出版的《2004-2005年山东省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报告》显示,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,肺癌的变化最为突出,从当时的第五位升至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位,至2004年升至首位,肺癌死亡率较20世纪70年代上升了4.92倍,胃癌则从第一位降到第二位。

为什么是她:“雾霾”永远沉积在肺里

“我不抽烟,不喝酒,也很注意饮食和锻炼,可为什么还会得癌症?”

最近几年,总有病人问钟南山这个问题。

这也是美国马里兰州针灸学院的中国教师杜莉的疑问。

10年前杜莉来到美国,40岁时患上肺癌。杜莉过去一直过着很干净的生活,吃得很好,家里没人患癌症。杜莉怎么会得癌症?美国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所环境肿瘤科主任黛芙拉·戴维斯在《一场错误的抗癌战争》一书中探究了杜莉的病因。

杜莉在太原长大。这座城市三面环山,从四周山下吹来的冷空气,将城里的大钢铁厂、焦炉厂

和铸造厂发出的烟雾控制在城里,无法散去。杜莉记得小时候只要穿上白衣服,几小时内就会布满黑色灰尘。

20世纪70年代,杜莉还是个小女孩,她每天呼吸的次数多过她身边的成年人,每呼吸一次,比头发小50倍的粒子会卡在鼻毛里。比这更小的微粒,比如汽车尾气,或者火力发电厂排出的废气则会穿过鼻子或嘴巴,卡在喉咙或肺脏表面。

美国一项有几十万义工参与的研究表明,居住在美国那些空气比较肮脏城镇的居民,罹患肺癌的几率较大,其中住在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的居民,罹患癌症的几率比一般人高出大约

30%。而肺癌这种疾病,要花上几十年时间才会形成。

对于杜莉来说,她一生当中头30年呼吸的太原空气,就好像跟一位每天要抽两包烟的人住在一起。杜莉后来虽然离开太原,但她同时带走了这个地方留在她体内的一些东西。

在钟南山看来,当前对健康影响最大的环境问题是空气污染,特别是PM2.5这样的小颗粒和臭氧。因为这些微小的污染物能够直接进入肺部,所产生的影响和刺激更大。

“雾霾天气对人体肯定有影响。”省内著名的胸外科疾病专家李振家教授直言。但雾霾弥漫,又有谁能“自强不吸”呢?

流行癌种:与工业化“同步”

20世纪20年代初,一个叫安德瑞·库尔南的研究员在巴黎医院实习。

“你必须到这儿来看看,否则再也看不到了!”大批医师跑去围观他们的第一个肺癌病例。这个被解剖了尸体的肺脏,整个外表包裹着灰黑色黏液,看起来像橡胶,很厚,黏黏的块状,就是当时十分罕见的肺癌。

肺癌不是“再也看不到了”,而是几乎与工业化的进程同步“流行”开来。

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,伴随着现代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大气污染,烟草消费猛增,男性肺癌死亡率迅速增长。

1973年初,周恩来、彭德怀、陈毅等开国元老先后被诊断患有癌症,高层由此关注中国癌症发病情况。从那以后,全国开展了第一次癌症综合科考。

考察团沿着太行山对晋、

冀、豫三省18个县的5000万人口进行癌症调查。他们注意到豫西北一带农民用树叶、萝卜叶子腌制咸菜、酸菜,当年八九月开始腌,一直吃到来年的五六月。腌菜罐子里面汤汁黏稠,含有大量微生物,有的还长了蛆虫,人们捞起来照吃不误。

当时,胃癌、食管癌等上消化道癌症是中国主要癌症病种。这是典型的“穷人病”,只要不吃霉变食物,就能降低发病率。

而直肠癌、大肠癌等下消化道癌症,在当时甚至不能挤进前五名。现在情况正好相反,结直肠癌等发病率快速上升,作为一种“富贵癌”、“生活方式癌”,发病率越来越高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,中国众多城市建立了工业园区,工业污染造成的恶果在2002年以来频频爆发,“癌症村”、“怪病村”频频出现,尤其高发于广

东、浙江、江苏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,GDP增长和“癌症村”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。

与此同时,与激素水平相关的癌症如乳腺癌、甲状腺癌、前列腺癌上升势头尤其迅猛。有数据显示,短短30多年间,癌症发病数量一路飙升,肺癌、乳腺癌、结直肠癌已占据前三名。

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研究发现,1978年,北京城区仅6000多人被诊断为癌症,而到2010年,猛增到3.7万,每天约有104个新癌症患者。

《2004-2005年山东省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报告》显示,2004年-2005年,山东省死因调查地区居民超过1/4的死亡为恶性肿瘤所致,粗死亡率166.86/10万,城市人群高于农村;小于35岁,每10例死亡有1例为恶性肿瘤;35岁-74岁,每3例死亡有1例为恶性肿瘤所致。

“邻避效应”:如何度过“环境敏感期”?

际是对于环境惶恐的应激反应。

2012年7月,因反对当地政府批准日本王子纸业之制纸排海工程项目,江苏启东市爆发群体事件,最终逼停立项。

这种“不要建在我家后院”的“邻避效应”在国际社会已是普遍现象,如今也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。这个环保名词的流行,说明中国经

济社会的发展已进入“环境敏感期”。对中国而言,“发展中”的现实国情,注定不能完全避免粗放的增长方式,“转型中”的经济现状也难以完全做到“零污染”。这个“环境敏感期”,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难题。如何面对这个“环境敏感期”的新考题,将对地方主政者的发展观念形成倒逼之势。

那些流行癌症
是社会经济发展
另一张脸

上周,就在漫天雾霾引发的对PM2.5的惶恐中,卫生部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了《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》,这个中国首次发布的肿瘤发病情况,绘出了一份清晰的“癌症地图”。

几乎各大媒体都转载了从这个年报而来的《全国每分钟6人确诊癌症》的新闻。这个说法虽然事后被证明为不准确,但恐癌情绪挥之不去——“下一个,会不会是我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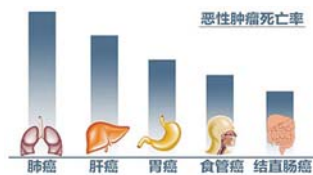
以发展中国家高发癌症为特点的上消化道癌症居高不下,以发达国家高发癌症为特点的肺癌、结直肠癌等迅速上升——中国癌症的流行特征,就像是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另一张脸谱。

公众对癌症的惶恐,实质也是“发展惶恐”的一部分。

2012中国“癌症地图”



■胃癌 上海、江苏、甘肃、青海等较为突出
■食道癌 集中在河南、河北等中原地区
■肝癌 集中在东南沿海及东北吉林等地区



(本报资料片)

◆一周三最

王洋
最执着“体制外人”

“就算是死,我也要死在编制里。”说这句话时,王洋虽然面带笑容,却带着一种让人堵心的沉重。



2012年10月中旬,哈尔滨招聘事业编制环卫工人,29名研究生报名,只有7名研究生有幸扫上了大街。落选的王洋带着对“编制”的深深眷恋在一家企业就业,成为一个“体制外人”。

社会舆论将板子重重打在了拥有各种福利的“编制”上,而没有对话不惊人死不休的王洋穷追猛打。只是“编制”的磐石几十年也未必撼动,而王洋却要在现实的矛盾中苦苦挣扎。

王洋的话让家长们的逻辑也乱了,以前,父母带着孩子走在大街上,看见环卫工人时会说:“你要是不好好学习,将来就去扫大街。”可现在,父母们会说:“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,将来才能有资格扫大街。”

周星驰
最“惹眼”政协委员

周星驰
刚当选广东省政协委员,立刻有好事者帮他草拟了两会提案:

一是官员财产公示紧迫性与必要性《九品芝麻官》;二是保护知识产权,鼓励自主开发《大内密探零零发》;三是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体系《长江7号》;四是给青年人才提供创业基金《喜剧之王》;五是稳中求进开放博彩业《赌圣》;六是司法重审需有法可依《审死官》。

周星驰的经纪人称,星爷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,可是有刘翔等明星委员的示范效应在前,人们担心,广东省政协这次是不是请来了一个更大的“花瓶”。

刘景一
最矛盾法学教授

刘景一
是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,可他做了一件和职业和信仰最矛盾的事——用下跪求得法律的公正执行。

因为代理海南省三亚市一农场83名职工相关农场经营权案子,被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两审均判败诉,上月底,59岁的法学教授刘景一带领职工到三亚市信访局门前跪访。但刘教授跪访似乎没多大效果,因为那天是周六,没人上班。

刘景一陷入了舆论漩涡中。有网友发出“法学教授刘景一,你给我站起来”的文章,有个学生还对他说:“老师,我将来不想从事法律工作了。”

相信听到这话,刘景一一定很痛苦,他嘴里讲着让学生相信的话,行动上却要背叛自己的信仰;他一生研究法律,关键时刻却用非法律的手段寻求法律的公正。这是他的悲哀,还是这个社会的悲哀? 文/张洪波